

哲 学 篇

中国哲学是中国传统文化的精华，中国哲学史是中华民族认识发展的历史。研究中国哲学史，目的是吸取其精华和优良传统，抛弃其糟粕，用以建设中华民族的社会主义新哲学体系。中国社会历史的发展，决定了中国哲学史独有的若干特征，如封建社会哲学历史最漫长，神学化了的儒教占有极大优势等。知人论世，把哲学问题放在特定历史范围内考察，是作者治中国哲学史的原则。

《哲学篇》中的文章，有的从宏观上纵览哲学发展的历史规律（如《从中华民族文化看中国哲学的未来》、《〈中国哲学发展史导言〉》），有的探讨哲学史研究的方法论（如《老子研究的方法问题》），有的是哲学著作或哲学家的专论（如《孙子兵法中的辩证法的因素》、《王弼‘贵无’的唯心主义本体论》），有的阐释某个哲学命题（如《中国哲学史的里程碑——老子的“无”》）。

作者步入学术界就怀有一种巨大的历史责任感。因此，作者努力使学术研究为社会现实服务，而又不失学术的严肃性。

从中华民族文化看 中国哲学的未来

—

文化的精华部分,集中表现为哲学。我们撰写的《中国哲学发展史》给中国哲学史定义为“中国哲学史是中华民族的认识史”,这个看法提出已有十年,现在仍然没有改变。

根据多年来从事中国哲学研究的经验和走过的曲折道路,深感考察中国哲学不能仅限于哲学本身,如果能把视野扩大,从民族文化发展的广度来考察中国哲学,可能看得更清楚些。

结合中国及外国的文化历史,纵向及横向考察,有以下几种现象:

(1) 文化发展的连续现象

中华民族的文化,从原始蒙昧中摆脱出来,不断前进,走着从低级到高级的路程,不断丰富其内容,由古朴到雕饰,由

质到文。哲学的发展也是这样走过来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历史才四十多年,但说到中国文化、中国哲学史有几千年而不是四十年。新旧政权之间可以一刀两断,新老文化是不能一刀两断的。“文革”中有些人宣称要打烂一切传统,事实证明这是愚昧的,也是做不到的。真正的革命者要对人类负责,对历史负责,要吸收全人类一切有价值的文化,不能随意地割断历史。哲学的发展也是有连续性的。正是因为有连续性,研究哲学史才有意义。

(2)文化发展的积累现象

文化有连续现象,必然产生新旧文化积累现象。文学史上从诗经、楚辞讲起。汉有汉赋,以后有骈文、五言诗、七言诗、律诗、词、曲,不断出现新的形式。人们发现,不是有了五言诗就抛弃了赋,有了词曲,五言诗、七言诗就不再流行,有了古文就不要骈文。文体越到后来越丰富,后期包容了前期。有了白话文,古文还在使用。抗战时期,毛泽东同志有一篇声讨国民党不积极抗战的通电,就是用文言写的,道理讲得很透彻,也很有气势。哲学发展也有类似现象,不是有了后来的流派,就不要以前的流派,有了汉魏就抛弃先秦。正是由于这种积累现象,才使得中国哲学的内容随着时代的推移而日趋丰富,古老的传统中包含着新鲜的内容。

(3)文化思潮的衰减现象

这里借用电讯通讯的概念,远距离的通讯联络,讯号逐渐衰减。为了防止衰减,中间设有接力站,使衰减讯号得到增益。有价值的文学作品、艺术作品,有永久的魅力,能使千万万后人为之感动。《诗经》、《楚辞》是中国不朽的作品,西方荷马的史诗、莎士比亚的戏剧也感动了千千万万的读者。随着时代的推移,它们的影响在逐渐减弱。比如‘五四’前后,青年男女要求从封建束缚中求得解放,《红楼梦》的影响很大。《红

楼梦》这部小说对现在的青年男女的影响比“五四”前后要小得多。

这种现象在中国哲学史上也存在。同一种思想流派在前一个时期有过广泛影响，在后一个时期影响有所减弱。如孟子在世时，用全力辟杨墨，韩非时代认为天下之显学为儒墨两大派，汉初杨、墨、儒的影响都减弱了。

有人说孔子的思想影响了中国两千多年，其影响越来越大。这种看法与实况不符。孔子思想的影响，单凭孔子思想本身，不可能越来越大，只能越来越小。孔子的影响久远和中途得到接力站补充有关。汉代有董仲舒的补充，振兴了几百年；宋朝得到朱熹的补充，又振兴了几百年。得到振兴的是董仲舒的孔子、朱熹的孔子，不能简单地说是原来的孔子的思想永不衰减。

（4）文化交流的融会现象

不同的文化思想的体系相接触，有时互相吸引，有时互相排斥。无论吸引还是排斥，最终总会发生融会。即使互相攻击的双方也经常从对方吸收自己有用的东西。显著的例子如佛教与道教两种宗教相互争论了一千多年，为了战胜对方，不惜借用政治手段来打击对方。结果表明，中国的佛、道两教都吸收过对方的思想甚至教义、教理。儒、佛、道三教的关系也是这样。

正因为融会普遍存在着，我们治中国哲学史，除了探究思想的传授关系，还要注意它的融会关系。过去研究佛教、道教、儒家的历史往往是单线的，各自为战，这不符合历史的实际。写佛教专史，也要兼治道教、儒家，写儒家专史，也要兼顾佛教、道教，写道教专史也要兼顾佛、儒，固不待言。

（5）文化接触的势差现象

两种文化体系，发生接触，会产生影响。文化形成于一定

的社会结构、民族传统。社会在进步，由原始朴素状态走向科学文明。应当承认社会由低级向高级转化这一事实。

文化水平有高低，征诸历史事实，总是文化高的一方（或民族、或集团、或思想流派）去影响文化低的一方，而不能倒转过来。中原封建的文化，秦汉以后的二千年间，不断与四邻不同的民族接触。接触的结果总是中原封建主义文化思想体系起着主导作用，带动了邻近的众多尚未进入封建文化的民族，使它们很快地进入封建文化的发展层次，接受中国传统的忠、孝观念，汇入中华民族文化的主流。两晋以后，南北朝，以及辽、金、元、清，统治者接受、继承了中华民族的封建主义文化，并在原来的基础上继续推行和发展。元朝的统治者占领了中原地区，有些爱国志士如文天祥为保存天地正气献出了生命。宋朝的政权结束了，而元朝的统治者接过儒教（儒学）这面旗子，继续扩大它的影响。宋元政权截然对立，宋元哲学思想体系是直接继承的。云南在宋朝是儒教影响不到的地区，元朝在云南兴建了文庙，把儒教的影响扩大到比宋朝更远的地区。（明、清的思想继承关系也类似。）

原因是中华民族封建文化高于奴隶制，更高于部落联盟制。高层次的文化必然影响低层次的文化。秦汉建国到1840年，中原文化与周围少数民族的文化相比较，基本上处在较高的文化层次上。

鸦片战争打破了中华民族封建文化的旧格局，从海上来了殖民者，他们早已进入了资本主义阶段，资本主义与封建主义相接触，西方资本主义文化比封建主义文化又高出一个发展阶段。这两者相撞击，封建主义处于劣势。从文化发展的势差现象来看，中国只能处于被动地位。

二

回顾过去中国哲学发展的经过及上述诸多现象，有助于我们约略地估计现在的道路和将来的远景。

哲学是回答关于宇宙、人生的根本问题的学问。中国传统哲学认为它是关于“天人之际、性命之原”的学问。它要高度概括、结合、吸收当时的人类认识的最高成果，提出问题，作出答复。提出问题，作出答复并不难，多数哲学家都作出不同的努力，但真正做到有权威性，对国家、民族、个人产生深刻影响的哲学家或哲学流派却不多。秦汉到鸦片战争的二千年间的有深刻影响的只有两家。第一家是西汉的董仲舒建立的天人感应、阴阳五行思想体系的神学经学。在这个庞大的“神学经学”体系里，用阴阳五行说，解释（不是解决）人们关心的天时、地理、历法、农业生产、行政措施、战争等自然和社会现象。这种解释在当时可以满足社会上下各阶层的需要，它建立了历史性的功绩。这种哲学体系配合汉代大一统的客观形势，对于加强、促进中华民族的凝聚力也起着积极的作用。

隋唐时期是汉以后中国封建社会政治、经济的又一个繁荣时代，文学、艺术都达到时代的高峰，惟独在哲学方面，唐朝没有形成一个完整、宏伟的哲学体系，不能完全解释当时人们心中的天人之际、性命之原的根本问题。当时，佛、道、儒三教鼎立，各有建树，自成体系，有时三教之间发生矛盾，抵消了精力。这一任务在北宋开始，到了南宋朱熹才完成。朱熹是中国传统哲学的第二次高峰时期的代表，他建立的理学体系对后世的影响比董仲舒更长。（董仲舒影响了约四百年，朱熹影响了约八百年。）宋代理学对自然现象、社会现象、行为规范、心性修养都有理论说明，它满足了当时社会上下各阶层的需

要，朱熹也建立了历史的功绩。朱熹的哲学体系，对于巩固中国封建社会，延缓封建社会的瓦解起了巨大的作用。朱熹的哲学体系引发了后来各朝代众多流派，有的补充它，有的反对它，有的修正它，直到‘五四’运动，这个体系才停止活动。董仲舒的‘神学经学’比较粗糙，朱熹的经学可称为“儒教经学”。他把儒家变成了儒教。在朱子的大力推动下，把儒家神学化，儒教是中国式的政教合一，比欧洲中世纪的政教合一从形式到内容都得到比较完善的结合。

回顾二千多年来中国哲学史的两次高潮，汉代的神学经学与宋代的儒教经学，是沿着同一个方向前进的。第一次高潮，奠定了中国哲学与封建社会集中统一的思想格局，中华民族形成了共同的民族意识，为后来加强国家的统一的意识形态，打下了坚实的基础；这就是建立了以忠、孝为核心的思想权威。后来的中国哲学，无论属于什么流派，都不能绕过“忠”、“孝”这两个关口，只能对它补充、加强，不能削弱、更不能与之抵触。

第二次高潮，朱熹为首的儒教经学，吸取、消化了佛教、道教心性修养内容，使之世俗化，把入世实践与出世修养结合起来，从而丰富了经学内容。推出了新的经典，用《四书》代替了《五经》，并且对新经典给予适合时代要求的解释。《四书》原文早已存在，朱熹一生从事《四书》的讲授和注释，他取得了最权威的《四书》的解释权。《四书》被后来历代政府列为国家教科书，《四书集注》被后来政府定为国家考试的标准答案。哲学思想得到行政命令的帮助推行，它更具有中世纪政教合一的特色。

鸦片战争以前，中国是一个大一统的封建国家，中国哲学要解决的是在封建大一统制度下产生的根本问题。秦汉以后的中国社会存在着中央政权高度集中与小农经济极端分散这

一对矛盾。中央政府必须强调集中统一，小农经济的本性是各自独立、一家一户为生产单位的个体经济。中国传统哲学力图找到政权高度集中与经济极端分散这一对矛盾的协调方案。从秦汉到清末，众多哲学流派都为解决这一对矛盾而尽力。

汉代的神学经学与宋代的儒教经学对中国封建社会发展有过历史作用。鸦片战争以后，中华民族不但缺乏汉唐的旺盛生命力，也失去了宋朝的“儒教经学”在文化层次上遥遥领先的优点。问题的关键在于中国社会的性质发生了变化。鸦片战争以后，中国成为一个半封建、半殖民地性质的国家，被迫地走向了世界，中国人逐步打开了眼界，接触了一些近现代科学技术，进而了解一些外国的文学著作、哲学流派、政治体制。哲学的研究范围和对象还是宇宙人生的根本道理即天人之际、性命之原。由于社会性质发生了变化，面临的使命不同了，眼界扩大了，看到西方哲学家是如何解释这些重大问题的，中国哲学的面貌也跟着发生了变化，中华民族的文化内容加进了新的成分。

今天，中华民族面临着建设社会主义新文化、新哲学的任务，新哲学是个什么样的形式和内容？

参照历史的经验，我们可以推测：

1 要与中国过去的哲学衔接，而不是与旧哲学完全脱离，平地构筑，或从外国全部移植，将来的中国文化吸收外来文化只能嫁接在原有的砧木上，不能焊接，这是从中国哲学的连续现象中得出来的结论。

2 建立新哲学，要总结过去人类一切有价值的文化成果，不能犯‘文革’时期的无知狂，抛开一切人类文化传统。这里所指的有价值的成果不只是中国传统哲学，外国的一切有价值的东西，也要吸收。

3 建立新哲学，要承认文化思想、哲学有衰减现象。希望用古代某一两个哲学家（比如孔子）的思想来支撑新局面，是不能成功的，它不能代替新哲学的新体系。

4 建立新哲学，要重视过去的哲学的融会现象，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吸收西方及东方哲学文化遗产的精华。新哲学不应当也不可能抱残守缺，孤芳自赏，而是汇百川众流。

5 由于文化交流的势差现象，在越来越多的文化交流中，会有不同社会发展阶段的文化相遇。当前国际社会，至少有三种社会形态同时存在着，封建主义的、资本主义的、社会主义的。我们对外开放，走向世界，势必有不同层次的文化涌来。我们对外来的不健康的東西统称为西方资产阶级腐朽文化，这是不准确的。资产阶级有腐朽文化，封建社会也有腐朽文化，有些腐朽的东西来自外部，有些东西本来就有，借外来的文化影响死灰复燃。如妓女、贪污等，古已有之，不完全是外来的。抵制资产阶级的腐朽文化的影响，只能用更高层次的社会主义新文化来占领思想阵地。封建主义抵挡不住资本主义文化。

三

未来的新哲学应当既有继承又有创新，既要吸收外来的（如马克思主义），又要与本国传统情况相衔接，还要看到我们面临的任务是正在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中国特色与中华民族的历史使命分不开。从政治变革的角度看，鸦片战争后，中国进行了四次政治变革。第一次是封建制度内部的改革派，为了抵抗外来侵略者而进行的斗争，如林则徐等人；第二次是戊戌变法；第三次是辛亥革命；第四次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民主革命到建立新中国。这四次的领导力量分属不同

的阶级和阶层。中华民族从鸦片战争以来，持续不断地在完成同一个历史使命，就是挽救中国的危亡，使中国从被奴役、受剥削的困境中摆脱出来。为了完成中华民族的这个历史使命，领导阶级更换了好几茬。前者完不成任务，由后来者取代；后来者不能胜任，再由它的后来者取代，最后由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华民族建立了新中国，摆脱了被殖民主义奴役的命运。中国社会也从半封建半殖民地进入了社会主义。

这是中华民族从来没有遇到过的新局面。中国作为独立的社会主义主权国家，和其它不同制度的一百多个国家和众多的民族共同生活在这个世界上，国土还是秦汉以来相沿几千年的土地，但活动的范围已不再限于《禹贡》九州方域之内，天下的范围扩大为全球五大洲。传统观念中的“天下”，包容不下今天‘世界’的内容。

“中国哲学史是中华民族的认识史”这个命题没有改变，但被认识的世界范围扩大了。当前中国哲学的内容应当包括中国传统哲学；已被吸收并纳入中华民族认识史的西方哲学思想(传统和现代的)还有指导中国革命的毛泽东思想。

中国哲学史上有过中外思想大融合的经验，像佛教传入中国后与中国传统文化相融合，成为中国的佛教哲学，给后人提供了可贵的经验。释迦牟尼本是外国人，后来被中国人奉为‘圣人’，与孔、老并称为‘三圣’。佛教中国化经历了漫长的融会过程，并不是一下就被广大人民所接受的。

中国哲学史研究的范围仍是‘穷天人之际，究心性之原’。未来的中国哲学应当能解释发生在中国的社会、历史、自然、人类思维等方面的根本性的问题。

现在虽不能预知中国哲学的新体系是什么样子，但可以从过去的经历推测，中国哲学的新体系，是中华民族优秀遗产的继承，不能脱离旧的传统构建一套与旧哲学完全脱节的体

系。

影响中华民族几千年的思想流派很多，影响深远的流派不过孔、孟、老、庄四家，四家中孟子是作为孔子的辅翼而出现的，庄子是作为老子的辅翼而出现的，说到底只有孔子、老子两家。孔子、老子留下的文字著作不多，主要来自他们的继承者的解释和阐发。六经中注释最多的是《周易》，诸子中注释最多的是《老子》。这种现象不是偶然的。因为从秦汉开始，中国建立了大一统的封建政权，高度集中的中央政府管辖着广大分散的农村，政治上的高度集中与经济的极端分散的统治格局贯穿了二千多年。强化集中统一，严格等级制，是中央政府的要求；要求自给自足，不要政府过多干预，使小农生产安居乐业，是自然经济的本性。在朝的强调集中统一，在野的强调分散自由。儒家偏重在朝，道家偏重在野。在朝讲孔孟，在野讲老庄。有时同一个人，做官时讲孔孟，不做官时讲老庄。这两大流派都有广泛的社会基础。朝廷的势力大于农民，所以孔子的影响大于老子。

有学者提出中华民族的优良传统是刚健有为，自强不息，有乐天精神。这个说法是有根据的，因为这是儒家《易》学的好传统。但是也要看到道家的贵柔守雌、以静制动、安时处顺，也是中华民族的传统，人们在处于劣势时使用这些原则得以转危为安。用这些原则来治民、用兵，往往收到奇效。刚健传统，使中华民族日新自强，贵柔传统，使中华民族避免蛮干。两者都有深远的传统。

此外，墨子的行侠仗义，济危扶困，为集体不怕赴汤蹈火，也在广大社会中起着影响。根据中国哲学史的继承、融会现象，新哲学也应当取来用作构建中国哲学新体系的思想资料。

中国哲学的历史任务，在于利用当时人类已有的知识，吸收可能吸收的文化遗产，结合中国哲学史的实际，创建中国特

色的符合社会主义要求的哲学体系。它不同于中国古代哲学史,因为它已融进了马克思主义哲学。这是一件极为艰巨的思想工程。新哲学能够解答人们关心的自然现象、社会现象、行为规范、心性修养诸方面的根本问题,说到底,还是解决“天人之际,性命之原”人类长期探索的根本问题。

就目前的主客观条件看,建立中华民族的新哲学,至少要有三条:

第一,繁荣强大的国力,安定团结的政治环境;

第二,积累充分的思想资料,只有中国古代的还不够,还要外国的,有的要翻译(中国古代哲学的重要著作也要翻译),使更多的人理解这些资料;

第三,要经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过程。

以上三条缺一不可,第三条更为重要。生搬硬抄造成的后患值得警戒。建立中华民族的新哲学,难处在于从一个完整、牢固的封建的中世纪脱胎出来的政教合一的哲学体系接着讲下来,不要像过去对待传统哲学所采取的一棒打死或置之不理简单化的方式。思想影响是打不死的,如小农意识有时会不知不觉地混进马克思主义。封建主义抹杀个人的合法权利,这种封建主义有时冒充社会主义的集体主义招摇过市。封建等级、宗法制度、狭隘的地域观念,都和马克思主义不相容,却经常出现,不肯退出历史舞台。

也有人认为春秋战国时期百家争鸣,思想活跃,学术繁荣,是中国哲学史上的黄金时代,认为秦汉以后的中国哲学显得单调,平庸,缺乏生气。其实这种想法是没有根据的。春秋战国时期的百家争鸣的根源不在于百家,而在于奴隶制解体列国林立,那是社会各阶层重新组合的过渡现象,百家争鸣正是为后来的秦汉统一准备条件。细看百家所争的不是论证各国长久分立,而是各家纷纷提供如何统一天下,治理天下的蓝

图,即可而知。

中华民族之所以屹立于天壤间对世界文化有所贡献,自己得到发展壮大,全得力于国家的统一。中国几经劫难,却能不断地克服危难,抵御外来侵略,救灾度荒,修文治史,作出伟大发明,都是在大一统的统一的国家主持下借助于综合国力优势才得以实现的。

鸦片战争以后,如果不是有几千年形成的民族共同体,长期培养的民族意识,我们也许早已沦为殖民地。马克思主义为中国指明了出路,这是中华民族经过长期选择后决定的。马克思主义的传播地区遍及全世界,以马克思主义作为立国思想,建成像中国这样的伟大的社会主义国家的却不多见。原因是多方面的,中国哲学、中华民族深厚的文化传统所起的作用决不可低估。

中国哲学的新体系的建成,一方面有古代哲学与现代马克思主义哲学相衔接的问题;另一方面,马克思主义哲学出世才一百多年,它本身还在发展成长当中。马克思主义哲学最大的贡献是它的历史唯物主义部分,这一部分从范畴到体系都在成长过程中。如“基础与上层建筑”是借用的比喻,后来上升为范畴的;有的用命题表达的方式尚未固定为范畴的,如“人民群众是历史的主人”有的是与其它学科共用的,如“生产力与生产关系”。这个新领域有着无限广阔的前途,但有待于发展、完善、壮大。在中国发展马克思主义哲学,是中国哲学史工作者义不容辞的责任。我们这一代人至少为创造上述三个条件,在本专业范围内尽力而为,取得阶段性的成果,才可说是为中华民族的文化建设尽了责任。

总结古代传统哲学,发展马克思主义,这两副重担都要中国哲学工作者承担下来。从需要来说,十分紧迫,实际进行的步骤却不能急于求成。这是时代交给我们的光荣任务,勉与

同志们共同努力。

(原载《哲学研究》1991年 第 11期)

《中国哲学发展史》导言

中国哲学源远流长，已经有了近三千年的发展历史。把中国哲学史建立为一门科学，距今不过三十多年。三十多年来，中国哲学史这门学科受到国内政治经济发展的总形势的影响，有时繁荣和前进，有时停滞和倒退，但总的趋势是前进而非倒退。

封建社会的哲学史名著，如黄宗羲的《明儒学案》、《宋元学案》，其中汇集了相当丰富的资料，注重各个学派思想演变的来龙去脉，今天仍然不失为研究宋明理学的有用的参考书。但是这两部学案却有一个根本的弱点，就是不敢触及“经学”的禁区，不敢大胆非议“圣人”。如同中世纪的欧洲哲学是包括在神学里面一样，在中国的封建时代，哲学还没有从“经学”中分化出来。“经”是圣贤垂训的典籍，封建社会的一切成员，只能宣传它，解释它，信奉它，不能怀疑它，议论它，更不能批判它。“五四”前夕，胡适出版了《中国哲学史大纲》上卷。这是用近代资产阶级观点研究中国哲学史的第一部著作，虽然有头无尾，却使当时人们的耳目为之一新，得到社会的广泛重

视。当时人们认为“新”的地方主要在于它不同于封建时代哲学史书的代圣人立言，为经传作注解，而敢于打破封建时代沿袭下来的不准议论古代圣贤的禁例，把孔子和其他哲学家摆在同样的地位，供人们评论。这是一大变革，标志着哲学开始从古代‘经学’的禁锢下解放出来，步入近代。继胡适之后，冯友兰的《中国哲学史》，梁启超、萧公权、钱穆等人的政治思想史、学术史，比封建时代的哲学史都不同程度地有所前进，但是由于缺少历史唯物主义这个先进的武器，总的说来，都不能算作阐明中国哲学史发展规律的科学著作。

解放前，郭沫若、范文澜、翦伯赞，吕振羽、侯外庐、杜国庠等同志运用马克思主义观点对中国的古代社会、古代历史以及古代思想进行了卓有成效的探索。他们开始运用历史唯物主义，进行科学的分析，从而有可能透过各种现象的迷雾，看到了一些真相，或者说更接近于真相。这正是马克思主义学者高出于资产阶级学者的地方。尽管这几位前辈们的著作有一些论点可以讨论，但他们走的道路是一条阳关大道，他们开拓荒地的功劳是不可磨灭的。使中国哲学史开始成为一门科学，他们的著作具有示范作用。

全国解放之后，在党的领导下，马克思主义被广大学者所接受，并被运用于一切社会历史研究领域内。中国哲学史研究这个阵地也在被马克思主义所占领。三十多年来，我们出版了通史、断代史、专题研究、论文集等，举行了几次大规模的讨论。尽管研究者在对于一些重要哲学家或学派进行历史探讨时，得到的结论不同，甚至相反，但是绝大多数人对于以马克思主义作为中国哲学史研究的指导思想，基本上没有分歧。问题在于我们怎样正确理解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则，怎样把这些原则和中国哲学发展的具体实际相结合。在这个问题上，我们取得了一些成功的经验，也走了不少弯路。粉碎“四